

【海外学者专稿】

# 历史学的未来：后人文主义的挑战

【波兰】爱娃·多曼斯卡<sup>1</sup> 著，张作成<sup>2</sup> 译

(1. 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 历史系，波兰；2. 哈尔滨师范大学 历史系，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在过去10年里，由于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联系加深，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解释范式或建构主义范式的象征化；在新唯物主义和新经验主义方面，出现了不同的甚至互相矛盾的趋势，它们主张“脱离文本”和“返归质料”。与这些变化相伴随的是，对人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批评（后人文科学）。

【关键词】后人文主义；后人文学；非人类中心论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1)02-0100-07

## The Future of History: The Posthumanist Challenge

Ewa Domanska<sup>1</sup>, Transl. by ZHANG Zuo - cheng<sup>2</sup>

(1. Adam Mickiewicz University at Pozn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Poland;  
2. School of Society and History,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ve undergone major changes caused by the deepen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humanities and the sciences (especially biology),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the so-called interpretative or constructivist paradigm, an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often contradictory tendencies related to new materialism and new empiricism, which advocate “turning away from the text” and the “return to the material” (which is present and accessible here and now). Those changes are accompanied by the critique of humanism and anthropocentrism (posthumanities).

**Key words:** posthumanism; posthumanities; non-anthropocentric paradigm

人文科学不能确定其范式，对当今世界的问题不能提供满意的解释，并且/或者不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使学者们日益陷入知识上的无助状态，缺少合适的语言或理论将这些完全是新发生的现象概念化（例如，战争性质的改变，生物统计学的扩展，动物基因的改变与人类对未出生婴儿的设计规划等）。为了寻找能够为世界提供有安全感的、可靠的、基于事实的知识，人文科学开始寻找新的目标与标准。他们正重新讨论善恶、真理、价值、美德、普遍性，人

性和神性这些永恒的“世界历史”问题。在这个生物技术飞速发展，生态危机和自然灾害日益严重的世界里，人文科学也在寻找有益于回答如何过一种道德上负责任的生活这类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法。

我在这里使用人类中心主义是指这种态度，将人类作为统治其他生物世界的中心，作为自然满足其需要的主人。这导致人类优越感（在人类身份的基础上，赋予生物不同的价值或权利），并且与人类对其他生物的歧视有关。一种

【收稿日期】2011-02-08

【作者简介】爱娃·多曼斯卡系波兰波兹南密茨凯维奇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业副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客座副教授；“国际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委员会”学术会议议程主席；国际史前与中世纪人类学委员会会员。爱娃·多曼斯卡的研究领域为当代英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人文与社会科学和后社会科学的比较理论。著有《微观史学：两个世界之间的邂逅》、《重描海登·怀特的理论面相》，编有《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等，已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非人类中心论的最佳范式，不以人类为中心，将非人类作为研究对象（通常除去其与人类的关系）。

我将“非人类中心论的人文科学”<sup>①</sup>或后人文科学定义为，从称作后人文主义<sup>②</sup>的思想运动与道德立场获取其特点的，一系列有组织的研究主题、技术和兴趣。后人文科学可以理解为继承人文主义之后的人文科学遗产的各种方法，进行非人类中心论或反人类中心论方面的研究。后人文主义的问题非常复杂，因为没有与这一术语相联系的突出的、相同的趋势，思考方式或哲学研究。这种视角涵盖的范围广阔，从讨论对待动物的伦理方式、打破物种界限、转基因、物种杂交，到生物测定学。然而，所有这些趋势的共同基础，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评反对。<sup>③</sup>后人文科学处理的问题包括、物种界限、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人类与技术，环境、动物、事物的关系）、生物权力、生物政治和生物技术。正如“后人文科学”<sup>④</sup>系列丛书编辑卡里·伍尔夫所强调的，这并不是要以某种方式否定人文主义，以及与其相关的价值。目的在于，如何使这些价值（正义、宽容、公平、高尚、人权等）成为人类特性的一部分，探究现今称作后人文科学的谱系。当人文科学变成后人文科学时，这些分析推动了以后的“人文科学”的形成。<sup>[1]</sup>

### 一、当前理论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方面的力所不及

知识是相对的，每个理论都是在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因具体需要而提出，所以，需要不断地修改。在日益兴起的后人文科学背景下，至关重要，我们从历史角度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不同解构方式）相关的方法，不是将它们的创立者（史学理论方面的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吉尔兹、萨义德、怀特）看做未来研究的开拓性权威，而是看做创立某些思考“总原则”的经典题裁的建立者。这些思想家和他们的方法必须从历史的角度看

待，并放在一定的语境中。这并不是说他们对当今的研究不重要，也不是说他们的思想无助于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我认为，当前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理论稍稍落后于当代世界正在发生的环境大变迁、气候变化危机、技术、遗传工程、纳米技术等，因而必须考虑新形势和技术创造的新现象。理论必须“跟上”当前研究处理的主要问题，因为现有理论与解释方法不足以解释迅速变化的世界。

我认为，要描述当前的人文社会科学状况，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方法比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与科学革命思想更有价值。在《科学与伪科学》一文中，拉卡托斯写道：“在一个进步的研究计划中，理论引导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是未知的新事实。然而，在一个落后的计划中，创建理论只是为了使其适应已知的事实。”他认为：“在理论落后于事实的地方，我们涉及的是落后的研究计划。”<sup>[2](p.5-6)</sup>我们应记住，理论“落后于事实”，就要努力追赶上来。按我的理解，我们现在观察到的这种状况，尽管落后的研究计划试图处理创造新事实新的主题（例如，动物、植物、事物），但实际上，这些研究计划并不能提出新的元语言，其他的解释模式和方法，将这些主题在变化了的语境中适当地概念化。

如果没有自然科学，就不会有当代开创性的人文科学。当今人文科学的争论没有不涉及进化论、生物学、遗传学、生物权力和生物群落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决定论正在被生物决定论取代，或文化中心论正在被生物中心论取代。当今对生物学、身体机制、物质性、动物、植物和事物的关注，是由一系列因素引起的，社会学家安德鲁·皮克林将其描述为：“后人文主义者取代了我们的解释框架。”<sup>[3](p.561)</sup>这正如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科学离不开符号学和文本、叙述、话语或符号这类重要概念一样，当今的人文科学如果不加强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如果没有以

<sup>①</sup> 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称谓，因为该术语太自相矛盾，不能完全准确地定义。对一些学者来说，这可能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人文科学观念的荒唐攻击。

<sup>②</sup> 请参阅：Andy Miah, "A Critical History of Posthumanism", in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 ed. by Bert Gordijn and Ruth Chadwick. Dordrecht: Springer, 2007; *Posthumanism*, ed. by Neil Badmington.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0; Cary Wolfe, *What is Posthuman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sup>③</sup> 源于科学技术（如学者唐娜·哈拉威、布鲁诺·拉托尔等），哲学的后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与文化研究（乔治·阿甘本，罗西·布雷托蒂·厄内斯托·埃斯波西托、卡里·伍尔夫）、生态哲学或生物艺术（共生A中心）的方法有重要区别。共生A中心——西澳大利亚大学生物艺术卓越中心——“是一所致力于研究、学习和批判生命科学的艺术实验室。它是这方面的第一所研究实验室，它使艺术家和研究者在一个生物科学机构进行湿地生物学实践。” <<http://www.symbiotica.uwa.edu.au>> 请参阅：Monika Bakke, "Zoe - Philic Desires; Wet Media Art and Beyond." *Parallax*, vol. 14, no. 3, 2008.

<sup>④</sup> 到现在为止，下面的书已经出版：Michel Serres, *The Parasite* (2007);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2007); David Willis, *Dorsality. Thinking Back through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2008); Roberto Esposito, *Bios; Biopolitics and Philosophy* (2008); Nicole Shukin, *Animal Capital: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2009; John Protevi, *Political Affect: Connecting the Social and the Somatic* (2009).

“生物”为前缀的概念，如生物权力、生物史、生物社会、生物继承、生物身份、生物归属、生物殖民、生物信息、生物价值等，便无法维持其存在。

我们不应将这些转变与过去使人文科学变成科学的努力混淆起来。就历史学来说，这种转变并没有表明下述事实：历史学变成了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在历史解释中使用模式（例如，亨佩尔的涵盖率模型），应用物理学定义的客观性和理性标准，贯彻科学概念所依靠的原则。相反，事实上发生的是，当前关于物种身份界限、物种（内部）关系，或人类与非人类关系的争论，根本上重新表述着“成为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因为各门人文科学越来越多地从自然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我们观察到一种互补的趋势：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互相补充。在提倡学科内或跨学科方法几年之后，现在是开始强调互补方法的时候了<sup>[4]</sup>。当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也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需求时，当进行自然科学研究产生了对人文科学研究方法的要求时，研究问题或主题可以描述为互补。对不同人文科学状况的比较研究表明，人文科学内部当前争论的核心问题，与自然科学领域争论的问题是互补的。如果我们同意是问题而不是方法论，将当今的不同学科联系起来的话，我们就开始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理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补性和（理论与实践上的）不可通约性（缺乏对当今世界变化提供满意描述和解释的、有效研究手段、方法与理论）概念，是描述当今人文科学状况的重要概念。我们可以说，互补性越大，不可通约性越小，因此，不可通约性是因为在既定问题上缺乏互补性。

上文所及皮克林巧妙地观察到，当今科学史的转型，不是由科学引起的，而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sup>[5]</sup>（p.418）当今世界，技术进步超过了科学进步，实践发展超越了理论发展，这就是人文科学领域所表现出来的不确定状况。人文科学也受到快速的文化变化的挑战（技术进步、生态危机、越来越具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和移民）。新现象出现（例如，生物认证），而既有现象存在于不同的背景中（例如，人群流动性与跨国籍），提出了不同的研究问题，促使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当今的人文科学理论努力解决着，它们与迅速变化的现实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以及其研究结果与社会期望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的问题。<sup>①</sup>换句话说，当学者们观察到变化，研究它们，并创造新的研究领域时，并无有效的手段将它们概念化。这在当今的人文科学领域是一个急

迫的问题。

后殖民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和底层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最近强调了当今理论在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时的无效性。他最近的文章《历史学的思潮：四个主题》（2009年）也标志着他学术兴趣的明显转变。他将自己定位为“对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历史学的性质深感兴趣的一位实践的历史学家。”<sup>[6]</sup>（p.198）他在这篇文章中，反思了传统人文主义者对自然史与人类历史所做区分的解体。他宣称，我们可以将其起源追溯到工业革命，但只是在20世纪下半叶，我们变成了“地质学个体”，这意味着人类变成了一种在地质意义上对这个地球有重大影响的自然力量。他建议，历史学家更多关注物种（及其群体性灭绝），关注人类的集体自我认同问题并且“思考作为一种生物形式的人类，将人类历史看做地球上生物历史的一部分。”<sup>[6]</sup>（p.213）他当然意识到了后殖民研究极力反对的普遍化的危险，但他并不为号召一种“没有预期结果的普遍史”担心。因为我在此表达的特别重要的观点是这一事实，他明确指出了当前方法与理论在处理不同的生态危机上的无效性。所以，查克拉巴蒂承认：

随着最近几年危机（当今的气候变化危机）日益加重，我意识到，我所阅读的所有理论，全球化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的分析，底层社会研究和过去25年来的后殖民批判，尽管在研究全球化方面特别有用，但仍未使我真正理解这种地球危机。<sup>[6]</sup>（p.199）

这个诚实的陈述表明，理论家们越来越意识到，在后现代主义的现实碎片化，微观叙述（微观历史）和地方史转向之后，有一种重新考虑“宏大问题”的需要，不仅从全球的角度，甚至可能从整个地球的角度去思考。

## 二、非人类中心论方法的一个理由

让我们从我经常在海登·怀特研讨班和演讲中听到的一句话开始：“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并不是一个职业选择。它是一个有关存在的选择。”循着这一重要改述，我认为，谈论超越人类中心论或后人文学主义，并不是研究一个虚幻的主题。这不是考虑一种认识论方法，主要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伦理选择。注意到技术飞速发展的成果，尤其是最近在遗传工程、生物技术、神经药理学、纳米技术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我确信，作为历史学家和思想家我们应重新思考与全球问题相关的“宏大问题”。

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非人类中心论方法的正当

<sup>①</sup> 我是在狭义上使用不可通约性这一术语的，不同于弗莱克、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对这一术语意义的理解。

理由？按照这种方法获取的知识的有效性是什么？换句话说，为了这种非人类中心论范式，我们需要什么？20世纪70年代介绍生态哲学概念的波兰学者亨里克·史克里默斯基，质疑科学知识的存在价值（建立在物理学基础上的科学方法）。“他在1974年写道，也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的——我们的知识，是帮助物种生存的最重要的方法。”<sup>[7] (p. 224)</sup>因此，知识一定要随着物种进化和人类的认知需要而发展和变化。他指出，为了保护人类，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知识，而是一种有益于人类存在的知识，并且追问知识为何不再致力于那个目的了。我认为，这个论述十分令人信服。如果我们考虑大量有关大屠杀的出版文献，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所创造的知识，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屠杀中，并没有阻止对人类的罪行。如果我们问：“我们当今需要何种人文科学？”我可能回答，我们需要的知识、认识和人文科学有存在价值，并且有利于物种的保护与持续存在。

我认为，在面对由遗传工程、神经药理学等引起的成为人的意义的根本转变时，一个“面向未来的”历史研究的大问题应该是：作为历史学家和思想家，应当推动何种研究问题、研究资料、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是为了加强通过反思过去获得的知识的存在价值，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道德动机（或伦理本性）。这些问题是关于正义、伦理、民主、自由、人权、尊严、上帝或神圣界的吗？我们所利用的何种认识应成为标准的认识？什么认识标准应确立为标准？所有这些问题在解释范式的方法上都有共同的前提假设，都十分关注人类的文化身份，而尽可能少地关注人类的生物方面，在一定意义上，通过关注人类内部的联系来避免讨论人类与神圣界的关系。因此，超越人类中心论方法并更加关注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是必要的（布鲁诺·拉图尔、唐娜·哈拉威）。从物种（生物学）身份和文化身份考虑人类，也是必要的。例如，对一些研究种族屠杀的学者来说，最基本的问题是被看做西方生命政治范式和人类主观的阈限表达的集中营。这表明生命权力的巨大效力：我想成为人吗？我有一种属于人类的种属意识吗？我感受到了与人类的休戚与共了吗？

从以上考虑来看，传统理解的处于时间中

的人的科学（马克·布洛赫）<sup>[8] (p. 23)</sup>，当前的历史学能从新目标、新问题研究，对文化功能的不同理解，对历史学涵义的不同理解中获益。例如，被看做一种趋势或研究过去的一个附属学术领域的生物历史学，表示出我们对历史学的理解是如何发展的<sup>①</sup>生物历史学给传统历史学带来三种变化，并且对其构成了挑战：对时间的不同理解（因此，布罗代尔的长时段也太短，不能包括人类的深层历史）；对人性的不同理解（这包括质疑人性本身，从生物学的观点打破了人类与动物的鲜明区分，认为人也是动物）；对历史学资料的不同理解（从遗传和信息方面对人口的关注，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血液成为与文本资料一样有价值的历史学资料）。而且由于与生命政治的关系，生物历史学指示了一种向后人类历史的转向（历史学受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

### 三、人类与非人类联合的趋向

我试图超越有关历史叙述、历史表象的争论。一般来说，关于文本与过去实在关系的争论，主导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理论。我认为，是挑战和超越研究过去的具体方法的时候了。历史学被理解为“处于时间中的人的科学”（马克·布洛赫），它不仅是欧洲中心论和以男权为中心，而且首先是人类中心论的。我们反思过去的对象应扩展到非人类存在上，这最近不同的学科中都得到了研究。当前，随着有关起义和军事的历史学研究的发展，事物、植物与动物也应该被纳入到历史学研究的领域之内，而不只是作为人类行为的被动接受者。

对过去的思考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学者们是否及如何改正自己对非人类个体的理解：事物、动物和植物。关于非人类个体在过去的地位的问题，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问题，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关系问题，人类与事物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将过去的研究重新概念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一个重大的挑战是，在一种语境中，而不是在符号学、话语理论和表象理论中重新思考过去的非人类方面，特别关注物质性、具

① Robert S. McElvaine, *The Relevance of Biohistory*.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vol. 49, no. 8, 2002. 生物历史学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Alfred W. Crosby, *Ecological Imperialism: 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 900 - 190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Stephen Boyden, *Biohistory: The Interplay Between Human Society and the Biosphere: Past and Present*. Paris: Unesco, 1992;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Biological Perspective: Patterns in Bio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Robert S. McElvaine, *Eve's Seed: Biology, the Sexes,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 of Human Societies* (New York: Norton, 1997); Gregory Cochran and Henry Harpending, *The 10, 000 Year Explosion: How Civilization Accelerated Human Evolu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9)

体性以及过去的当下存在。<sup>①</sup>

受布鲁诺·拉图尔影响的学者们，对人类与非人类通过不同的接触过程如何相互联系并形成一整体感兴趣，对它们如何通过不同的转型过程交换其特性感兴趣。法国学者宣称：“客观性并不是指心灵的一种特性，正义与公平的一种内在状态，而是指能够存在的事物，……对抗它们所讲述的内容。”<sup>[9](p.115)</sup>按照这种方式思考，客观性与抵抗或反抗同义。拉图尔认为：

如果社会科学家想成为客观的，他们必须找到稀缺的、高成本的、地方性的、超自然的情境。他们可以在那里尽可能地创造对抗关于自身所做述说的研究对象。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术语提出问题，而不是用那些没有共同兴趣的科学家的术语！<sup>[9](p.116)</sup>

探求对抗性的对象——一种抵抗主导理论的对象——是反思过去的非人类中心论计划的目标。这种思想与安德鲁·皮克林号召寻求“奇特对象”的主张契合。

受质疑的科学研究工作，首先试图从经验上展现世界中一些奇特对象的存在：人与事物的组合，人类与非人类的组合。在这些组合中，前者的发展有利于后者的形成，反之亦然。<sup>[10](p.308)</sup>

按照皮克林的观点，这些奇特对象，这些组合正日益挑战社会科学，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如果认真考虑的话，它们能够改变不同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定义。

我认真对待这种挑战。几年前，按照拉图尔和皮克林的论述，我自己寻求不合常理的、奇特的、不纯粹的对象。2003年，我在加利福尼亚采访了几位当地地表葬室的负责人。我对如何用新技术来保存人的尸体感兴趣。我执迷于生命宝石——由人的骨灰合成的钻石。对我而言，它是超越了有机物与无机物关系的有趣事例。大约同时，我听到爱德华·卡茨发明转基因荧光兔的消息。这个转基因动物在自然中是不存在，是遗传工程的产物。卡茨说，创造荧光兔“阿尔巴”是为了“检查常态，异质性，纯粹，杂种性和差异性的概念；为了思考一个并非符号学的交流概念，它跨越传统的物种界限共享基因构成。”<sup>[11](pp.101-131)</sup>2002年，来自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两位艺术家乔治·特雷梅尔和福原志保提出了一个《生物存在》的计划。《生物存在》计划的

目标是将人的DNA植入树中，而且不改变植物的基因，以此来创造“活的纪念碑”或“转基因墓碑”。我们几年前听到了奥斯卡·皮斯托留斯的故事（以“银翼杀手”闻名）。他身戴假肢打破了赛跑记录，但由于其“超人类”的能力而被拒绝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

我认真研究了上面提到的现象。我发现，我所知道的所有理论手段（符号学、心理分析、话语理论、后结构主义、诠释学等）都没有使我彻底了解它们。这意味着打破有机物与无机物，自然物与人工物，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上面提到的这些方法对我来说太抽象、太书本化了。我在寻找一种方法，该方法超越建构主义者的文化决定论观点，是更加唯物主义的，更加本体论的。那种方法使我理解有机物到无机物，人类到非人类的转变。用一个词来分析这些现象，是挑战。当我们目睹了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出现时，人文科学还没有描述它们的理论手段，还来不及将它们概念化。

人文学科日益将其关于认同、变异和排斥的争论对象，扩展到非人类实体上：动物、植物与事物。他者不仅是不同人种、性别、阶级、性取向或宗教取向的人，而且是不同种族或有机地位（例如，无机物）的人或物。研究主观的不同表现，我们发现传统标准不再有效了，而通行的建构主义观点限制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传统标准的基础是对主体的文化与社会理解，有机/无机、人类/非人类的二元论的、等级式的思考方式。<sup>②</sup>建构主义观点从人种、性别和文化产物认同的其他方面来思考。在物种认同界限成为人文科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将超越主导性的建构主义观点的文化决定论。

例如，当前有很多“回归事物”<sup>③</sup>的讨论。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完全忽略了事物。正相反，研究事物是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主要任务。然而，正如我在上文指出的，关键在于发现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既超越对事物的实证主义描述，又超越将事物看做文本、符号或隐喻的符号学方法。叙事主义和文本主义通过将事物类比为文本，将研究类比为阅读，将事物看做一种信息或符号“消解了”事物。在努力扭转这些消极趋势的过程中，“新兴事物研究”指向事物的动原，强调事物不仅存在而且行动并有行动潜能这

① Ewa Domanska, *The Material Presence of the Past*, transl. by Magdalena Zapędowska.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5, no. 3, October 2006.

② 需要指出的是，从逻辑角度理解的人类/非人类，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人类的概念能够与动物或事物对立，而非人类概念是人类概念的反义词。

③ 尽管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研究事物不是一个新领域，但新的方法，新的解释种类使它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事物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关于这种发展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Ewa Domanska, *The Return to Things*, transl. by Magdalena Zapędowska. *Archaeologia Polona*, vol. 44, 2006.

个事实。<sup>①</sup> 事物能动作用的概念，不仅意味着事物有目的，而且意味着它们在与人类的联系中有一定的地位。对那些受马塞尔·莫斯思想影响的学者来说，事物具有社会化功能，它们巩固人际关系，在个人与群体的层面上参与创造人类认同，并且指示其变化。

当今盛行的从差异性方面区分非人类（被看做“他者”的动物、植物和事物）的主导性方法，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它仍然属于人类中心论的人文科学，属于“启蒙的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方法也被称做家长制，因为该方法对非人类的他者预设了一种霸权态势。该方法暗示了人类的主导性与等级关系，人不仅对其他人负有一定责任，而且对非人类有责任。人类以这种方法代表非人类行动，借以履行一种保护性契约。<sup>②</sup> 这种方法促进了一种殖民话语。非人类在这种话语下被看做一种脆弱的他者，类似于妇女、儿童和残疾人的境遇。这种方法导致了动物、植物和事物的完全拟人化。这种方法证实了下述看法：像对人一样去对待动物与事物，是一种重新解决人类处境问题的方法。然而，即使在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框架内，提出非人类主题的问题，意味着挑战人类中心论的地位。这是阻止人类起源学，即阿甘本所谓的“人类学机器”的第一步。

人类境况最近在生物技术，生物权力，生物政治学领域中受到特别关注，是无需强调的。使阿甘本等感兴趣的人类的残暴行为问题是并且一直是特别重要的。阿甘本的著作作为后人文学奠定了基础，但他的计划仍延续着依赖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传统。他在《开放的人与动物》中描述和分析了上文提到的“人类学机器”的构造。这种机器区分了人类与动物（很多学者用这个概念逐渐取消人类中心论范式）。阿甘本的很多概念值得任何想从事后人文学研究的人重视：人类学机器，在人类中创造非人类、圣人、

起源与生长的关系，生物权力问题。我阅读阿甘本的著作，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我想成为人吗？我具有属于人类的归属感吗？我感觉到了与人类的休戚与共了吗？

#### 四、史学理论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已经提出的“在历史科学中超越人类中心论”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未来反思过去的可能发展方向。<sup>③</sup>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元语言，它要求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和解，要求进一步增进与认知主义方法的关系。<sup>④</sup> 正如海登·怀特曾经指出的：“我们偶尔进行这种实证主义运动”，我们确实也是这一运动的参与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作为一种主导趋势的建构主义（超越“文化决定论”），密切关注新唯物主义，新经验主义或绝对本体论。<sup>⑤</sup> 我们需要变得更加经验主义，关注由下而上构建理论，避免将理论看做一个以工具主义方式运用研究资料来证实自身合理性的“工具箱”。帕特里克·乔伊斯最近将这种由下而上对待理论的方法称为“具体的理论”。这里的问题不是将一种理论应用于资料上，而是资料扩展我们理论想象的能力。<sup>[12](p. 216)</sup> 乔伊斯宣称，“科学研究”日程是挑战“来自上层的理论”方法的最佳选择，因为它支持有针对性的研究，并从实践方面来思考科学。

我们研究过去的内容取决于当前的问题。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了解关于人类潜能与局限，了解人性的发展前景与存在的危险。换句话说，这是为了不仅在文化层面上，而且在物种层面上理解成为人的意义。这种趋势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新）环境史学、生物史学和遗传史学中特别明显。它将早前生物学与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历史化，防范生物决定论，强调生物学研究与人类的文化身份之间的互补性，及其生物和文化遗产。这些分支学科主张研究长时段的“深层历

① 在处理事物的媒介时，学者们经常引用的著作有：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s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② 参见：Gisli Pálsson, *Human - Environmental Relations: Orientalism, Paternalism and Communalism*, in *Nature and Society*, ed. by Philippe Descola and Gisli Páls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③ 我们也应该考虑使用“对过去的反思”（或对过去的研究），而不是限制我们思考历史学的历史研究。后者将历史学理解为一种在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传统下发展起来的研究过去的方法。

④ 约翰·扎米托在其下述文章中，试图调和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John Zammito, *Toward a Robust Historicism: Historical Practice in a Post-positivist Environment*, in *Handbook of Historical Theory*, ed. by Nancy Partner and Sarah Foot. Sage, 2009; John Zammito: *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 Post-Positivism in Science Studies from Quine to Latou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⑤ 德勒兹的经验主义（追溯到1953年以及在《经验主义和主观性》一书中对休谟的研究），在理论与经验研究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受德勒兹影响的曼纽尔·德兰达使用了一个“绝对本体论”的概念。他为社会理论基础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这种社会理论是建立在德勒兹本体论基础上的一种新实在论的组合理论（网络、城市、市场、民族国家）。德兰达将实在看作自主的，精神独立的，创造生命形式的物质与能量过程的结果。请参见：Manuel DeLanda: *A New Philosophy of Society. Assemblage Theory and Social Complexity*. London: Continuum, 2006; Graham Harman: “DeLanda's Ontology: Assemblage and Realism” *Continental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41, 2008; Arturo Escobar: “The ‘Ontological Turn’ in Social The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ies*, vol. 32, no. 1, 2007; Nicholas Gane: “Concepts and the ‘New’ Empiric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12, no. 1, 2009.

史”，取消“史前史”这个缓冲区，建立一个人与文明出现时的人类之间的连续统一体。<sup>①</sup>“深层历史”将人文与社会科学和物理与生物学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反思过去的可能发展方向。这个方向不仅仅是历史学的。历史学变成了对广义的生物与文化意义上的生物的研究。

正如马克·布洛赫多年前在一部法国史学名著中预言的，我们的文明正日益远离历史。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历史学应该成为一种行动性的知识。例如，历史学一方面成为一种使人类理解和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与自然状况的知识，另一方面发展人类的道德本能。如果现代人试图重新定义人类以及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将历史学理解为人类的自我认识（柯林武德）特别重要，<sup>[13](p.10)</sup>其前提是当代证实人性的方法是批判性的。我们需要的历史学，要活化人文主义传统的重要价值，创造和加强我们共享的人性的意识，人类的团结，它的历史持续性和多样性或易变性。

#### 【参 考 文 献】

- [1] Cary Wolfe, *Introduction to "PostHumanities" series* <[http://www.carywolfe.com/post\\_about.html](http://www.carywolfe.com/post_about.html)>
- [2] Imre Lakatos, *Introduction; Science and Pseudoscience*, (1973), in his,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ed. by John Worrall and Gregory Currie.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 [3] Andrew Pickering, *The Mangle of Practice; Agency and Emergence in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9, no. 3, November 1999. 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关注自然科学动原的分配，宣称其动原分配是不对称的，也应归因于非人类个体（他也使用术语“物质动原”）。他的观点与米歇尔·卡龙和布鲁诺·拉托尔相对立。请参阅：Material

- Agency *Towards a Non - Anthropocentric Approach*, ed. by Carl Knappett, Lambros Malafouris Berlin: Springer, 2008.
- [4] Edward O. Wilson, *Consilience: The Unity of Knowledge* New York: Knopf, 1998 (参见第九章《社会科学》)
- [5] Andrew Pickering, *After Representation; Science Studies in the Performative Idiom*. PSA: Proceedings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2 (Symposia and Invited Papers), 1994.
- [6]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 Critical Inquiry*, vol. 35, no. 2, Winter 2009.
- [7] Henryk Skolimowski,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in Biology*, i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ed. by Francisco Jose Ayala and Theodosius Dobzhansk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8] Marc Bloch, *The Historian's Craft*, transl. by Peter Putna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 [9] Bruno Latour, *When Things Strike Back; A Possible Contribution of Science Studies to the Social Scienc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51, no. 1, January - March 2000.
- [10] Andrew Pickering, *The Objects of Sociology; A Response to Breslau's "Sociology After Humanism"*.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18, no. 2, July 2000.
- [11] Eduardo Kac, *GFP Bunny*, in Eduardo Kac: *Telepresence, Biotelematics, and Transgenic Art*, ed. by Dobrila, Peter T. and Kostic, Aleksandra Maribor, Slovenia: Kibla, 2000. 卡茨最近创造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一种基因合成的花，是卡茨自己与矮牵牛花的合成物，被称为爱德牵牛花，表示只有这位艺术家的DNA存在于这朵花的纹理中。Eduardo Kac, *Life Transformation - Art Mutation*, in *Signs of Life: Bio Art and Beyond*, ed. by Eduardo Kac.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7.
- [12] Patrick Joyce, *What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vol. 206, no. 1, February 2010.
- [13] R. G. Collingwood, *The Idea of History*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译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讲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 张晓校】

<sup>①</sup> Daniel Lord Smail, *On Deep History of the Brai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